

诗赋研究丛书

• 赵逵夫主编 •

诗辨新探

郭晋稀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诗赋研究丛书
赵逵夫 主编

诗辨新探

郭晋稀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辨新探/郭晋稀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4.3

(诗赋研究丛书)

ISBN 7-80659-565-1

I. 诗... II. 郭... III. 古典诗歌-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6950 号

责任编辑 周田青

封面设计 李文金

诗辨新探

郭晋稀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5号 (028)84122206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字数 200 千

2004 年 4 月第一版

200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00 册

ISBN 7-80659-565-1/I·204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诗赋研究丛书》序

赵逵夫

文学的领域中，什么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诗赋。人们常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这是因为，虽然世界各个国家文学的百花园中都有诗，但是，诗是语言的艺术，而中国的诗歌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是汉语的艺术。

汉语最大的特征，就是单音节，无词尾变化。古汉语则一字一音，一音一义，无附加成分。双音词一般由单音词组合而成，伸缩分合甚便。汉语又是以汉字为记录符号的。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结构特征，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书面语交际中误解的机会，又在表情达意和读音上有一定的提示、暗示性。所以，所谓“文言”，其词语的组合搭配，词序的变化，用词中的借代等，都十分灵活，在体现语意的缓急轻重及此轻彼重、此重彼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等等方面，不必加附属句，即可通过词语句法的变化含蓄地表现出来。抒情言志、通幽达隐，以有限的文字，表无穷的含义，实非其他语种可以比拟。

又由于一字一音的方块汉字的特征，中国诗在语言布置方面可以作到形式上的完全整齐同节奏音律上的错综变化的统一，对仗、骈俪的艺术美因素也因而形成。

诗在本质上是抒情的，小说在本质上是叙事的。中国传统的诗歌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而长于抒情。黑格尔在其《美学》的《抒情诗》一节中说：

在对东方抒情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个别民族之中，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人，其次是印度人，第三是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①。

尽管黑格尔对中国的诗了解不是太多，但也道出了部分的真理。

中国诗歌抒情特征的形成，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②，但同汉语汉字的特征应不无关系。

但是，诗毕竟是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学式样。真正由汉语汉字的独特性而形成的我国所特有的文学式样，是赋。骈文亦以骈辞丽句为特征，但骈文中有些不属于文学的范畴，故这里只说赋。

所以说，在文学的领域中最能体现我国文化之特质的，是诗赋。

自《诗经》最早地集结了我们民族抒发喜怒哀乐的歌唱和反映着当时政治礼仪、社会风俗的诗篇之后，屈原融合南北文学，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朱先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231页。

^② 如黑格尔认为，哪些民族的诗较发达和成熟，同民族特性、时代观感和世界观有关。他说：“在民族特性，时代观感和世界观之中又有某一些比另一些更适宜于诗，例如东方的意识比西方的（希腊的是例外）就较适宜于诗。在东方，未经分裂的，固定的，统一的，有实体性的东西总是起着主导作用，这样一种观照方式本来就是真纯的，尽管它还不具有理想的自由。”见同上27页。

写出了千古绝唱《离骚》，从而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此后贾、枚先后承风，开汉赋先河；马、扬以巨丽为美，润色鸿业；班、张赋京都，赵、蔡疾世邪，摹物抒情，俱有佳构。及至六朝，则诗人迭起，赋家如云。说到唐朝，则无论诗、无论赋，都是美不胜收，如初唐四杰，李、杜、韩、柳，及樊川、玉溪，岂止是诗坛神笔，实亦是赋苑圣手。宋代以后，诗、词、曲、赋，俱有发展变化，其切今铄古者，代不乏人。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我国民族精神的确立时期，而《风》《骚》辉映，也奠定了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汉唐盛世，一以赋睥睨八荒，一以诗雄视百代。则《风》、《骚》、诗、赋，不仅是中国文学文化的宝藏，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纽带。

为此，我们在文学的领域中选择了诗赋，决定出一套《诗赋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中既有老一辈学者几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有中青年学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作的新的探索；既有研究专著，也有对作品的整理、诠释和评注。后者主要是想在目前被忽略了的方面做些工作。当然，某些热门课题中，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将提出来与学术界朋友们共商。

希望得到学界朋友的支持与批评指正。

1993年5月于西北师大中文系

读郭晋稀先生《诗辨新探》

——代序

郑永晓

宋诗是继唐诗之后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宋人生在唐人之后,既是他们的大幸也是大不幸,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空前绝后的唐诗,既为宋人准备了丰富的遗产,也为他们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屏障。宋诗若在唐诗的基础上变唐人之所已能,发唐人之所未尽,有所创新,自出机杼,其艰辛不易实不难想象。宋初,王禹偁、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或宗白居易,或学李商隐,要皆未出中晚唐范围。仁宗时,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等力辟西昆诗风,崇尚气格,诗风为之一变。其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出,堂庑为之阔大,宋诗至此,臻于极盛。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尤

其是黄庭坚诗深析透辟,气骨瘦硬,句律之工,妙绝天下,最足以代表宋诗之特色,且又有法可依,沾丐后人,非止一代,宗之者遂衍为江西诗派。但苏黄等人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也为宋诗造成生涩枯淡之弊。尤其是江西后学既无深厚学养作基础,一味模仿,凿空强作,左规右矩,不能稍出新意。于是又有四灵、江湖派诗人起而矫之。然而四灵、江湖派诸人,诚如严羽所说“止入声闻辟支之果”(《沧浪诗话·诗辨》,以下凡引《诗话》,均出《诗辨》),若萤火微光,无足轻重,仍未发现学诗做诗之正大法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严羽写出了《沧浪诗话》。必须明了严羽写作该书的这种背景,才能进而分析其针对性和在诗学理论上的贡献。然而,对《沧浪诗话》中某些关键性的论述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建国后出版的各种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研究著作也都对严羽的诗论作重点阐述,而且都承认这是宋诗话中最有系统与理论深度的诗话,但对严羽提出的“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和“妙悟说”依然聚讼纷纭,歧见颇多。笔者早年阅读《沧浪诗话》,虽时有所得,而面对众多治学名家的阐释,茫然无所适从。今读郭晋稀先生的《诗辨新探》(以下简称《新探》)则有拨云见日之感。著者覃思精虑,对《沧浪诗话》总纲与精义所在的《诗辨》作了系统、透彻的考察,对“别材”、“别趣”、“兴趣”、“妙悟”诸说的阐述与分析,可以说深得严羽论诗之旨,也最能体现《沧浪诗话》论诗体系的严谨性。此书体例之严谨、论证之精密、观点之新颖,在近几年的古代文论研究著作中尚不多见,它基本廓清了数百年来围绕严羽《沧浪诗话》引发的一系列学术争议。故笔者不揣浅陋,谨为介绍如下。

力辟众说,自出机杼是该书最大的特点。翻开这部仅有十万字的著作,却随处可见著者独到、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在《沧浪诗话》研究史上,著者首次提出,严羽所阐述的“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妙悟说”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题材论、题旨论、创作论、学习方法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今案严羽“别材、别趣”之说,历代评论家争议颇多,综而言之,大致可以归类为下列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严羽把“别材”和“书”、“别趣”和“理”作了对立,即把作诗和读书、穷理作了对立。如明黄道周称:“此道关才关识,才识又生于学,而严沧浪以为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此真瞽说以欺诳天下后生,归于白战打油钉铰而已。”(《漳浦集》卷二十三《书双荷庵诗后》)此种论点,只要稍加研读严羽原著,便不攻自破,是以建国后出版的数种有关著作均否定此说。另一种观点认为,“别材”当作“别才”,应释为天才、才气,是说诗歌和书、理有别,需要另一副才调。如徐经谓:“诗学自有一副才调,具有性灵,试观古人未尝不力学,而诗则工拙各异,则信乎才自有别,非一倚于学所能得也。”(《雅歌堂砬坪诗话》卷二)张宗泰则云:“余则以严氏所谓别才别趣者,正谓真性情所寄也。试观古今来文人学士,往往有鸿才硕学,博通坟典,而于吟咏之事,概乎无一字之见于后,所性不存故也。”(《鲁岩所学集》卷十三)这种论点在今人的有关著作中得到了较多赞赏,如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即主此说。然而,上述理论本身虽不可谓不精辟,也确乎有益于诗学,但若用来阐述严羽

的《诗辨》则不免有南辕北辙之嫌。针对围绕“别材说”的一系列争议,《新探》从考察严羽之前及其同时讨论“以书为诗材”的大量事实出发,判定材为诗中之材而非诗人之才。进而指出,严羽所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是批判苏、黄“资书以为诗”的,“非多读书,无以极其至”是批判晚唐诗派“捐书以为诗”的。“别材说”的提出,是诗材问题讨论的总结与提高,是从诗材的个性来探讨“什么叫诗”。与此相类似,严羽“别趣说”是针对苏、黄作诗尚理而言的,是从诗趣的个性说明“什么叫诗”。其含义有二,一是诗趣与文趣的分别;二是诗之说理与之说理在手法上的区别。这些分析较之某些论者不去考察严羽论诗的针对性,而斤斤计较严羽论诗偏于禅趣而忽于理趣,偏于性理而远于义理等更符合实际。考之严羽对“邵康节体”为代表的性理派诗人的态度便不难明了。

同样,《新探》对《诗辨》中提出的“兴趣说”和“妙悟说”也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曾有论者将“兴趣说”视为《沧浪诗话》中的批评论,而将“妙悟说”视为创作论。但是严羽本人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这里所谓“法”即指作诗之法门,当然也可以成为学诗论诗的门径。不过,综合考察严羽《诗辨》便不难发现,“兴趣说”实为创作方法论,而“妙悟说”在于解决如何获得这种方法,即学诗之方法。诚然,严羽以“有无”考察了汉魏、盛唐诸公以至苏黄等人的诗歌创作,但严羽的目的正在于阐释汉魏古诗、盛唐诗、苏黄诗三种类型作品创作方法的异同。在他看来,“盛唐诸人,唯在兴趣”。“近代诸公,不问兴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所谓“兴趣”、“兴致”、“意兴”意旨大抵相同。汉魏之诗出于天籁,是自在的而非自

为的,不嗜使事、用典,只见意兴,故曰“无迹可求”。盛唐诸人作诗则是自觉的,但又非无病呻吟,他们是在特定情境的强烈感染下,情感不能自己,故喷薄而为诗,其诗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情味隽永,耐人咀嚼。而苏黄等人,尤其是江西末流尚理而缺乏意兴,“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既不懂如何运用诗材,又不懂诗趣的特点,其作诗方法是自我创造而违背诗之个性和创作规律的。在这三种方法中,汉魏诗歌天然自得,无法可寻,“近代诸公”又走入歧路,只有盛唐诗人出于自觉而又符合创作规律的方法,也即“兴趣”,为后人学诗开启了不二法门。严羽认为,作诗之法是从前人诗中悟出来的,谢灵运至盛唐诸公是透彻之悟者,他们的作品最符合诗之个性,因而后人学诗当以盛唐为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新探》指出,“兴趣说”是历史上言“兴”之继承与发展,又为严羽所独创;“兴趣说”是与“别材、别趣说”相辅相承而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相对立的观点。这就极为清晰地勾勒出严羽《诗辨》的基本论诗主张,展示出《诗辨》诗学理论的严密性、系统性。

由于严羽以禅喻诗,造成后人不少误解。有些人站在儒学立场攻击严羽援禅入诗。如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诗教自尼父论定,何缘坠入佛事?”如冯班《严氏纠谬》等又指责严羽在禅学上的种种失误。这些指责既未触及问题的要害,也无关严氏论诗宏旨。今人视“妙悟说”为创作论,以为“妙悟”近于今日所言之形象思维,并进而探讨“妙悟说”与佛教禅宗、先秦道家思想的关系。凡此种种似均未能把握严羽诗论之精髓。《新探》将“妙悟说”视为学诗方法论,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可见严羽以为“悟”

是诗道的根本问题,那么,“悟”是什么?从何处悟入呢?严羽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以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可见严羽所说的“悟”就是学,诚如《诗辨》开宗明义所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所以严羽又提出熟参,所谓熟参也与禅学所讲不同,而是指学习前人、体味前人之作。可见,悟、妙悟云云只是以禅喻诗。严羽自己就说:“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又说:“论诗如论禅。”郭绍虞先生指出:“用一‘如’字,可见只是用作比喻,并不重在禅义与诗教之同异。”(《沧浪诗话校释》)《新探》令人信服地指出,以禅喻学诗不同于以禅谈学诗,以禅喻学诗,必须学诗与学禅有可以相喻之处;但学诗和学禅不同,不能以学禅谈学诗。以学禅喻学诗,是因为二者都要下苦功夫,因此可以相喻。但学诗并不如学禅那样要竹榻蒲团、面壁十年即可顿悟,而必须广泛学习前人的优秀作品。因而,严羽“只是以学禅喻学诗,而非以学禅谈学诗,论者以唯心哲学的帽子去指责他,道理并不充足”(第五卷《“妙悟说”新探》)。按照这种思路,严羽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段人言人殊的譬喻就易于理解了。从诗人处理词、理、意兴三者的关系看,融词、理于意兴之中,读者只睹作者的意兴,不见使事说理的痕迹,即是“无迹可求”。推而论之,则“羚羊挂角”即喻“无迹可求”,“不涉理路”即喻说理“无迹可求”,“不落言筌”即喻使事“无迹可

求”，其他言“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莫不以喻“无迹可求”，所以《新探》指出：“古今学者，因为自己懂得禅学，乃以禅说《诗话》，皆通人之蔽也。”（第四卷《“兴趣说”新探》）冯班《严氏纠谬》：“诗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与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者乎？诗者讽刺之言也，凭理而发，怨诽者不乱，好色者不淫，故曰思无邪，但其理玄，或在文外，与寻常文笔言理者不同，安得不涉理路乎？”云云便不免胶柱鼓瑟之嫌了。

除了系统地考察严羽《诗辨》的理论体系，针对各种有关“别材、别趣说”、“兴趣说”、“妙悟说”的误解——辨正外，《新探》还在涉及有关唐宋诗歌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之见。如著者认为，建国后对苏、黄诗尤其是黄山谷诗的评价失之公允，诗史中足以与李、杜并列的诗人，只有苏东坡、黄山谷。严羽反对苏黄，只是斥其不问兴致，并非反对创新，附录中关于严羽诗论与李清照词论之继承关系等观点均足以新人耳目，启发后学。著者在《结尾》中阐述了该书的写作目的，“首先想阐释清楚《沧浪诗话》；其次是想把它作为突破口，谈谈应该如何写一部诗史”。应该说，著者的这一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三

四

论证精密、分析透彻是该书的另一特色。面对古今众多的《沧浪诗话》研究著作和各式各样的论点，《新探》紧紧把握住严羽著书的目的，也即探讨诗的个性和特点，前人作诗之法及今人如何学诗

等,逐一考察严羽所谓“别材、别趣说”、“兴趣说”和“妙悟说”,以为“别材”是针对苏、黄混淆诗材与文材而言;“别趣”是针对苏、黄不分诗趣、文趣而言;“兴趣”旨在阐述正确的作诗方法;而“妙悟”则示人以可行的学诗途径。如“别材”后人引用或作“别才”,释为天才、才气,今人多有赞同此说者。《新探》则指出,从《诗人玉屑》引用起,即作“别材”不作“别才”,《沧浪诗话》的各种刻本也大都作“别材”。《诗话》的本意,“材”本是书,只有“别材”非关书,不说“不是书”,还说“要多读书”,可见材即是书。“诗有别材,非关书也”是批判苏黄“资书以为诗”;“非多读书,无以极其至”则是批判四灵、江湖派诗人“捐书以为诗”。著者引用胡珵《苍梧杂志》“东坡尝谓钱济明云:凡读书可为诗材者,但置一册录之,亦诗家一助”等十余条材料,证明苏、黄作诗主张多读书以书为诗材。又引《后山诗话》:“子瞻谓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苏子瞻云:‘退之之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耳’。”以为苏轼即以孟浩然诗无材料为才短,则谓韩愈才高,显然是指其学博。而严羽则说:“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对比苏轼、严羽所论,《新探》认为,事非巧合,正是严羽有意提出“别材”反对苏黄堆积故实的。这些分析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基本廓清了历代有关“诗材”问题的种种误解。

四

高瞻远瞩,从诗史的高度,将《诗辨》置于中国诗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辨正地考察是该书的又一特色。以往对严羽诗论,尤

其是“别材、别趣说”，往往视为一个时代的孤立现象，因而既未能理解其真正涵义，自然也未能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有鉴于此，《新探》十分注意严羽诗论的继承性，在总结清理前人诗论的基础上，探索严羽吸取了前人哪些合理的成分，进而结合严羽诗论的针对性论证其独创性和在诗歌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在第一卷《绪论》中，著者详细考察了六朝和唐代有关诗材诗趣问题的讨论，广引沈约、刘勰、钟嵘、萧纲、陈子昂、殷璠、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有关言论，指出运用什么样的诗材和诗趣才符合诗的标准是历史上经常讨论的问题。严羽《诗辨》中的“别材、别趣说”正是上承历史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但他著书立说的针对性，却又不在重翻旧案，而在于解决苏、黄倡导的新体诗、新诗论所引起的“什么叫诗”的新论争。为探讨严羽“兴趣说”的历史渊源，《新探》着重分析了唐代皎然的《诗式》，以为《诗式》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探讨“怎样做诗”的专著。皎然关于材、趣辩证相关，事、义互为联系，用材与趣、事与义必须讲究方法等观点为严羽提出“兴趣说”开辟了道路。著者认为，“兴趣说”之“兴”来自于古人于诗言“兴”；于“兴”之外而又言“趣”则异于先秦两汉，而是综合了陆机、刘勰、钟嵘、皎然以来诸人的情味之说。至于把“兴”与“趣”合而为一，兼言“兴趣”则是严氏之独创。这些分析均言之有据，深入透辟，既阐明了严羽诗论的继承性，又揭示出其独创之功，具体论证了《沧浪诗话》在中国诗论史上的杰出地位。

该书的附录亦颇值得注意。其中《从中国诗论的发展看严羽“别材、别趣说”的涵义及其贡献》一文究源竟委，系统考察了“别材、别趣说”与“言志”、“缘情”、“风骨”诸说的关系，俾使读者了解严羽论诗之渊源。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严羽论诗与李清照论词》一

文。众所周知,李清照所著《词论》,强调词与散文、诗歌的区别,认为音乐性是词的特点,因之必须“协音律”,分别“五音”、“五声”、“六律”和“清浊轻重”。她批评苏轼等人忽视词的音乐特点,以诗为词,因而成为“句读不葺之诗”。因此她说“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其目的,一是争取词在文坛上的独立地位,二是反对苏轼等人以诗为词。《新探》指出,李清照认为词不同诗,故曰词“别是一家”,严羽认为诗不同于文,故曰“诗有别材”、“诗有别趣”。问题的表面虽只是仿佛相同,而其实质则完全一致。李清照论词批评苏轼为“句读不葺之诗”,实质上也是从词材、词趣而言的。著者进而从时间上论证了严羽诗论借鉴《词论》的可能性。这种追本溯源,通过深入比较得出的结论显然颇具说服力。著者首次揭示了严羽论诗与李清照论词的关系,也显示出其独到的眼光和深入辨析事物本质的能力。

郭晋稀先生曾著有《文心雕龙注译》,功力深厚,见解独到,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作全面而系统研究今译的著作。现在我们又有幸读到郭先生这部富有创新精神的《诗辨新探》,深感获益良多。我们预祝辛勤耕耘的郭先生在治学道路上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1992年春于北京

滥竽中国文学史的教学,近四十年了。想找个突破口,从创作理论的角度写本古代诗歌发展小史,但长期以来没有动手。《沧浪诗话·诗辨》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是诗歌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研究我国诗歌发展的最好突破口。把这本小册子当作对“诗辨”的探索,自然是我的本意;把它当作一本不好的从创作理论写的诗歌发展小史,也未尝不可;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意图,就希望它一身而二任。

我早年就爱好《沧浪诗话》,却没有用心去研究过它。1984年,友人告诉我:“1985年准备在福建邵武纪念严羽,拟请您和士昉同志参加。”这个消息既引起了我对武夷山的游兴,也想趁此机会认真研究一下众说纷纭的《沧浪诗话》。

我首先翻阅了近数十年来主要各家研究的成果,对一些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因而拟定了一个论文纲目;但是总感到自己读的书不够,下笔有许多困难。士昉同志是教宋代文学的,因此我将论文提纲交给了她,和她商量讨论。经过一番磋商,她承担了提纲中大部分文字的起草任务。因此写出我们的第一篇论文:《从中国诗论的发展,看严羽“别材”、“别趣”说的涵义及其贡献》。(因为该文的论述,大部分是本书正文所未涉及到的,所以略加修改,收作附录。至于其中论点或与本书稍有不同,行文亦与本书稍有重复,就不一一改写了。)